

馮玉祥夾攻唐生智

王禹廷

馮玉祥與西北軍之二十一

舉行「朝會」的「不敢忘」

馮玉祥率軍參加革命行列後，便切實奉行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當時的「打倒列強、除軍閥」（這是當時唱遍全國的一首歌曲中的開頭兩句。）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政策。他爲了加深官兵們同仇敵愾的精神，就仿照春秋時吳王夫差「報父仇」，越王句踐「雪國恥」，所作的「不敢忘」問答方式，也給編了個「不敢忘」，下令全軍於每天「朝會」時實施。這種「朝會」，不知是何人倡始，在北方軍中頗爲流行。其意義跟現在的升旗典禮相彷彿，但舉行的時間則較早。在西安，馮玉祥每天黎明，就集合總部全體官兵，以及駐在西安或過境暫駐的部隊在新城廣場，舉行「朝會」。他站在台上高聲發問，全體與會的人都要同聲回答。其問答的詞句如下：

問：「我們國民軍，歷年戰爭，爲的是打倒侵略我國的帝國主義，和賣國軍閥，你們明白不明白？」

答：「明白。」

問：「我們和帝國主義及軍閥拼命打仗，是爲救國家，救人民，不是爲一二人，你

們知道不？」

答：「知道。」

問：「我們的弟兄們，爲救國家，救人民，死了的還沒有埋葬，傷了的也沒有藥治，不傷不死的現在又無衣無食，你們忘了沒有？」

答：「不敢忘。」

問：「我們直隸（河北）、山東、河南、北京一帶的同胞百姓們，被匪軍姦淫擄掠，欺壓的不能生活，我們應該救他們不？」

答：「應該救。」

問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應當怎樣做法呢？」

答：「應當不怕死，不愛錢，忍苦耐勞，明白主義，來救國家，救人民，誓雪此恥。」

上列這幾則「不敢忘」，每天清早都要逐一

問答。問答完畢，再來一段訓話。馮氏具有演說天才，他講話從不準備講稿對衆宣讀，無論是專題報告，抑或針對當時狀況有所訓示，都是信口道來，激昂處扣人心弦，輕鬆處引人發笑。那時沒有擴音器，就憑他那洪亮的嗓門，標準的河北

官話，清清楚楚的把他的意思傳送到聽衆的耳中。而且善於運用姿態和表情，加強他講話的效果。又能體察聽衆的程度，把握聽衆的情緒，使用聽衆容易聽懂的語句、事實、或譬喻，深入淺出，莊諧并用的發揮他主觀的意思。務使聽者容易領會，發生共鳴，久而久之，深入人心，對於官兵們革命精神的激發，發生了很大的功效。有一次，南方來了一位要員，「躬逢其盛」的參加這一「朝會」，不禁潸潸下淚，說是半生革命，未嘗得有這樣的興奮，這樣的感動。其予人印象的深刻，由此可見。

馮玉祥在西安舉行這樣大規模的集會，除了他親自主持施教以外，還常常選派高級將領或者邀請外來的貴賓、專家，出席講演，給官兵灌輸新思想、新智識。同時他也不斷跑到西安附近地區的駐軍中，集合官兵，照樣的來這一套，並要求各級部隊長，一律確切實施。

這是馮玉祥個人對於政治訓練工作所採取的獨特作法。因爲當時沒有具體的規制可循，教材可用，幹部又感缺乏，他不得不這樣的身教言教的領頭做起。關於幹部問題，他除了如前面所說以速成訓練的方式作應急的解決以外，並迭電廣

州國民黨中央，請求多派得力的同志，迅速北來工作。但因南北遠隔，道路中阻，廣東方面的人手也不充分，一時派不過來。馮氏爲求速效，乃獨出心裁，運用軍事訓練的方法，以推進全軍黨化、政治化的計劃，即所謂「寶塔式」的計劃。他站在最高的頂端，往下逐層逐層的推行。以他個人最大的努力、威力和感力，由上往下推動到軍長、師長、旅、團、營、連、排長，以至士兵。大家成天講的是主義、革命，聽的也是主義、革命。耳濡目染，口誦心維，積久成習，雖不能說是百分之百的深入，但也相當的普及了。

廣東派來「政工小組」

廣州國民黨中央，由於馮玉祥不斷電請，乃於民國十五年十月，派了一個政治工作小組，前往國民軍工作。因爲吳佩孚、張作霖、孫傳芳等部大軍，此時尙盤踞華中和東南各省，這個小組的人員，不能集體公開的由陸路北行。他們便遵照上級的指示，各自選擇途徑，分頭出發，以西安爲目的地。此小組共有政治工作委員四人——郭春濤、鄧飛黃、簡又文、于永滋。郭、鄧兩人屬國民黨「新右派」，反共最烈。簡又文是國民黨老同志，民國十三年改組時，他不在粵，此時因爲要到國民軍工作，剛剛補辦了入黨手續，他與徐謙有舊，與孫科關係密切。于永滋是共產黨員。這四個人，可說是當時國民黨的一個縮影。另外還有十四名工作人員，合起來共有十八人。他們有的穿越敵軍區域，有的沿海線到天津，再轉西北，還有攜帶重要文件資料的，則由粵沿海到海

參崴，經過外蒙、綏遠，再入甘、陝。他們殊途同歸，於十二年春夏間，大都陸續到達西安，只有于永滋和另外幾個人，始終未來。國民黨中央對於這個小組的此行任務，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和重視。他們離粵出發時，幾個重要領導人，曾有如下的指示，諸如：

「馮軍有極大的優點——全軍上下篤信基督教，以教治軍，故軍風紀律嚴明，愛人愛國，作戰勇敢，斷不可摧毀這優良因素。譬如爲嬰兒洗澡完了，傾盆倒去污水，但切勿連盆內的嬰兒也倒去。」共產黨及左傾分子，極端反對宗教，鮑羅廷故作此警惕要語，庶免他們到馮軍後惹出麻煩。其用心之深與思慮之密，值得驚異。其實馮軍中以前雖有傳教士的踪跡，馮氏也被人稱爲「基督將軍」，但實際上教會對於馮軍官兵的影響，并不如外傳之甚。它們紀律嚴明，作戰勇敢，乃出自多年來的嚴格訓練所造成。鮑氏所說，未免失之皮相。司法部長徐謙，希望他們以基督精神，幫助馮玉祥實行革命事業，成爲真正的「國民革命軍」。

交通部長孫科，指明中央給他們最大最重要的特殊任務，是聯絡馮氏，拉緊馮軍，務使與「國民革命軍」站在同一戰線，一致行動，以期完成北伐，統一中國之大業。孫氏與簡又文關係親密，故對簡尤致其殷切的希望。簡又文於民國十三年、四年間，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教，即因徐謙的介紹，與馮相識。馮在北平創辦求是中學，延聘簡氏負責籌備，并出任校長。以後時局變化，學校

暫時停辦，簡乃南行回粵。此番奉派到馮軍工作，心中十分高興。他以後與馮相處的時間較久，關係也十分融洽。孫科與馮玉祥之間交往，多由他從中奔走。簡氏現已年逾八十，住在香港。

鬥爭與摩擦的困擾

馮玉祥對於這批人員，非常歡迎和重視。即以郭春濤爲政治部第二副部長，以後劉伯堅離去，由郭代理主持部務。鄧飛黃爲新設立的政治訓練班主任，以後大軍東開，總政治部之下成立了一個「前敵政治工作團」，鄧氏調充該團主任，隨前敵指揮部出發工作。簡又文兼任總司令部外交處長，稍後繼鄧飛黃爲前敵政治工作團主任，再後郭春濤一度離開，簡以副部長代理部務，最後則在洛陽創辦今是學校，兼任校長。其他由粵北來的幾位政治工作人員，也都派任了相當的職位和工作。

這批人到西安，給馮玉祥帶來了許多新的宣傳文件，帶來了國民黨中央的若干不算新的內幕情況，使馮氏獲得了一些新的認識和啓示。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問題與困擾，因爲那時國民黨和共產黨，表面上在合作，實際上却鬥爭的很激烈，國民軍自然也不例外。這些人來了之後，不但增加了國、共間的鬥爭，也增加了國民黨內左、右兩派的摩擦。好在這種鬥爭和摩擦，多局限於政治工作的部門，於軍隊的影響并不很大。這一個不好的副作用，直到清黨以後，才漸漸消除了。國民軍於東出潼關，會師北伐的前後，就在如上所說的努力中，從事於軍事學術科和政治思

想的訓練，而重點則擺在政治思想方面。時間很短，困難很多，進步則很快很大。

寧漢分裂北伐中挫

民國十五年、六年間的寧（南京）、漢（武漢）分裂，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。這一分裂的形成，是先有武漢左傾政權的出現，繼有南京清黨反共的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的建立，兩相對峙，擾攘將近一年。直到武漢政權垮台，國民政府及國民黨重歸統一，才告結束。我們以研究歷史的眼光來觀察，如果那個武漢政權不被撲滅，很可能產生兩種後果，其一是較好的看法，南北紛擾，了無已時，我們的國家重陷於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前分崩離析的混亂局面。其二是最壞的看法，我們的國家早已赤化，成爲國際共產陣營中的一份子，不會等到毛澤東擴大叛亂，竊據大陸的時候。或好或壞，這兩種現象必居其一，當無疑問。

於此，我們應該深深感謝當時的蔣介石總司令。他獨燭機先，堅強奮鬥，才能以他爲中心，團結所有的反共力量在南京重新建立了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。把那個反動的武漢政權，及早撲滅，挽救了我們國家幾瀕於危的命運。此外，我們還提到一個人，那就是馮玉祥。他那時以大西北爲基地，受到蘇俄的支持，手握重兵，雄據中原。他左袒則左勝，右袒則右勝。故爲寧漢雙方所必爭，所力爭，而武漢方面，由於種種關係，相信馮玉祥會站在它們的一邊。但是馮氏却以國家的利益爲重，無視於蘇俄的支持和武漢的拉攏

，毅然決然的和蔣總司令結合在一起，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領導，加強蔣總司令的反共力量，就把武漢政權的給弄垮了。此中經過，說來話長，我們一幕一幕的往下談吧。

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，國民革命軍由廣州誓師北伐，不兩年而底定幽燕，統一全國。當時一般人把這場戰爭叫做「大革命」，領導、主持，完成這一「大革命」任務的，就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先生。這場戰爭成功的迅速，在歷史上堪稱空前，然而其過程却是十分曲折，複雜而艱難。

十五年、六年的冬夏間，由粵北伐的國民革命軍，規復湘（湖南）、鄂（湖北），底定東南，長江中、下游兩岸及其以南的廣大地區，全爲革命軍所掌握。由綏（遠）、甘（肅）南下的國民軍聯軍，也已平定甘（肅）、陝（西），進軍中原，此時北洋軍閥吳佩孚、孫傳芳兩大主力，均被擊破。張作霖的奉軍雖尙完整，但它斷難以獨力遏阻國民革命的浪潮。就此一大形勢而論，如果南北對進的兩大革命武力，能够合作北伐，奮力挺擊，則揮軍幽燕，直搗黃龍，當屬指顧間事。不幸正在北伐進行的中途，國民革命的陣營內，却發生了嚴重的分裂內鬨，乃給北洋軍閥以苟延殘喘的機會，遲滯了北伐統一的過程，從而導致了以後幾年一連串的紛爭。浪費時間，虛耗國力，大大的影響了我們革命建國的大業。

在這段時間內，國民革命的內部及其敵對的陣營，都發生了相當重大的變化。就其演變的過程看，可說是極盡錯綜複雜之能事。

先從國民革命的內部說起。

武漢政權建立經緯

武漢政權，是北伐初期，由廣州遷到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所構成，理論上它是合法的。但因這個政權，是在蘇俄顧問鮑羅廷幕後操縱，共產黨徒及附共的左傾份子把持之下，從事於赤化中國陰謀的推行。它本質上是對國民革命的一種反動，故不爲大多數矢志於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人，及廣大的中國人民所接受，所承認。因此，於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國民黨厲行清黨之後，這個反動政權便告消滅。

武漢政權，肇始於民國十五年十二月所謂「臨時聯席會議」的成立，結束於十六年十一月唐生智失敗下野，歷時約爲一年。它幕後主持者是鮑羅廷，名義上的領袖先爲徐謙，後爲汪精衛，支持它的武力則係唐生智。其建立的過程及進行的策略，有如下述：

國民革命軍於十五年秋季、冬間，規撫兩湖（湖南、湖北），攻佔贛（江西）、閩（福建）以後，蔣介石總司令，屢電廣州中央，請將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移駐武漢。於是隱操黨、政實權的蘇俄顧問鮑羅廷，偕同國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長陳友仁，司法部長徐謙，交通部長孫科，財政部長宋子文等，於十一月十六日離粵北上。十一月二日到達南昌，小住數日，與駐在其地的蔣介石總司令晤談。旋即轉道赴鄂十二月十三日，在漢口成立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」（簡稱「臨時聯席會議」），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未到以前，行使最高職權

。這個聯席會議的主席是徐謙，參加的有宋慶齡、鄧演達、宋子文、陳友仁、吳玉章、孫科、王法勤、唐生智、詹大悲、董用威、蔣作賓、于樹德等人，這是武漢政權建立之始。以後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，於十五年底遷到南昌，鑒於武漢政權，完全為鮑羅廷及左傾份子所把持，原擬暫在南昌辦公，策劃清黨。嗣經有關各方不斷洽商，又於三月七日，由贛遷鄂。至是，國民革命的黨、政領導中心，便在武漢正式建立起來。除了原來「臨時聯席會議」的諸人外，譚延闓、丁維汾、何香凝、李烈鈞、陳公博、顧孟餘、經亨頤、柏文蔚、彭澤民、惲代英，均在其中。稍後，于右任也由陝趕來參加。這個黨和政府，都是鮑羅廷以「太上皇」的地位，在幕後操縱運用。左、右兩派之爭，日趨激烈，右派則居於劣勢。鮑羅廷及俄、共黨徒當時的策略，是「我們在國民黨內的政策，應當是擴大左派與左派的聯合和他們共同的應付中派，而公開的反攻右派。」而在具體行動上，一方面積極推動所謂「農工政策」，在兩湖及粵、贛地區，實行清算鬥爭武裝暴動，企圖建立赤色政權。一方面則加緊進行「倒蔣（介石）」、「迎汪（精衛）」、「結唐（生智）」、「聯馮（玉祥）」的活動。

武漢政權肆力「倒蔣」

「倒蔣」的目的，是爲了摧毀國民黨新興的中央領導中心，俾便於俄、共黨徒們篡（國民）黨奪權，赤化中國。「迎汪」，「結唐」只不過是「倒蔣」的一種手段。至於「聯馮」則還有其另外的作用。

蔣介石總司令，秉承 國父遺志，與師化仗，很快的把革命勢力伸展到長江流域。功業之高，物望之隆，自然而然的成爲國民黨新起而強有力的領導者。但是他繼承的是國民革命的正統，奉行的是三民主義。這與蘇俄及其羽翼下的中國共產黨赤化中國的行徑，大相逕庭。乃被俄共認爲是它們推行赤化的最大障礙，必欲去之而後快。它們在北伐進展之初，就已採取了許多不同的手段，對蔣總司令大事抨擊和破壞。十六年三月中旬，在漢口舉行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，出席的委員及候補委員三十三人，其中共產黨員佔九人，其餘多是附共的左派份子，真正能够代表國民黨的只有譚延闓、孫科、李烈鈞等二、三人。在這俄共黨徒及附共的左派份子操縱把持之下，作出了幾項重大的決定，其主旨全在削弱蔣總司令在黨、政方面的地位及其國民革命的統帥權力。以推翻國民黨的領導中心，代之以俄、共黨徒與左派聯合組成的武漢政權。

令原是中央政治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主席，因組織修正而被免除了。

(一)「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」，將原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人事權和指揮權，轉移集中於軍事委員會主席團。主席團七人，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會指定，其中至少須有未任軍職之中執委三人參加。會中選出主席團七人：汪精衛、唐生智、程潛、鄧演達、譚延闓、蔣中正、徐謙，又是左派佔多數。

(二)修正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」，規定總司令只有指揮作戰的權力，而作戰動員令須經軍事委員會決議，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核准。

(三)「外交統一案」，表面意義在制止軍事長官在戰區與外人辦理交涉，使軍事與外交分離，實在是限制蔣總司令在進軍（南）京、滬（上海）時，不得辦理外交有關事宜。

(四)「統一革命勢力案」，其內容是規定國民黨與共產黨第三國際間的關係，使共產黨以公開身份，參加政府工作及民衆運動，而國民黨左派組織聯合政權，作爲建立完全共產政權的過渡。

(五)廢除國民政府主席一職，改設常務委員五人：孫科、徐謙、汪精衛、譚延闓、宋子文。竟把蔣總司令給排除在外了。

根據上述修改各種組織及改選人事的名單觀察，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它們儘量的貶抑和剝奪了蔣總司令在黨、政、軍各方面的地位及權力，而把這些大權，轉移集中在左派份子手中，以便鮑羅廷及俄、共黨徒的控制。同時完全違背了國父聯俄容共的本義，使共產黨得到篡（國民）黨奪

權的合法地位，以推行其赤化中國的陰謀。

在此前後，鮑羅廷更指示其俄、共黨徒及左傾份子，發動了一項所謂「提高黨權」的運動。它們說是爲了糾正黨權旁落及軍事獨裁的現象，高呼「一切權力集中於黨」。它們運用各種各樣的手段來「反蔣」「倒蔣」，說是「黨裏有獨裁的傾向」，要藉提高黨權運動來糾正這個傾向。

它們不斷散佈謠言，誣指「蔣介石要實行軍事獨裁」，「蔣介石濫用軍費」，「蔣介石摧殘農工」，「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，與奉、魯軍閥勾結」。「蔣介石受封建官僚與反動政客包圍」。以破壞蔣總司令的信譽。另外它們還利用蔣總司令調整部署，調動軍隊的機會，製造謠言，對各將領大事挑撥，破壞部隊的團結，減低其對革命統帥的向心力。這樣一來，不但唐生智的異圖更趨囂張，第四、七兩軍的粵桂系將領，及第六軍的程潛，也均發生誤解。他們惑於俄、共之「迎汪（精衛）」口號，曾有所謂「第三勢力」或「第三派」的運動，標榜「中立」，推汪精衛做「名義上的政治傀儡首領」。

由於這種種策動的影響，它們認爲「蔣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已喪失大半」。「革命軍除第一軍外，其他如第二、三、四、七、九、十各軍，都已加入『反蔣陣線』」。武漢的國民政府，乃敢於四月六日發表命令，任命蔣總司令爲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，（按非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。）馮玉祥爲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，南北兩個集團軍兩個總司令比肩而立。又以何應欽、程潛、李宗仁、唐生智爲第一、二

三、四方面軍總指揮（按稍後任命閻錫山爲第三集團軍總司令，升任唐生智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。）歸第一集團軍管轄。四月十五日，又下令免除蔣總司令的職務，將第一集團軍全部軍隊，劃歸軍事委員會指揮。至此，蔣總司令的合法職位，便被武漢政權完全剝奪了。

汪精衛的最大錯誤

國父逝世後，國民黨的三大領袖是汪精衛、胡漢民和蔣介石。（汪精衛和胡漢民，是國父生前的兩大臂助，國父倚之如左右手，胡漢民且曾幾度代理過國父所擔任的職務，國父逝世不久，汪精衛被選爲國民政府主席。蔣介石當時在資望上較汪、胡兩人稍遜，一般人都稱他們爲汪、胡、蔣或胡、汪、蔣。後來蔣公勳望日隆，凌駕汪、胡而上之，便改稱蔣、汪、胡或蔣、胡、汪。最後胡死汪去，蔣公就成爲世所公認的全國全民的唯一最高領袖了。）胡於十四年八月廖仲凱被刺案發生後，被迫赴俄。汪於十五年三月中山艦事件後，稱病出國。留在國內一肩挑重任的，只有蔣介石一人。現在俄、共黨徒，既以蔣公爲排斥的對象，又視胡漢民是右傾份子而難合作，便把利用的目標擺在一向左傾的汪精衛身上。它們發縱指使，由中央到地方，響起了一片「迎汪回國」的口號，展開了「迎汪回國」的活動。同時，以蔣介石爲中心的國民黨反共人物，感於俄、共的陰謀日著，必須團結所有的反共力量，加以遏制。他們既怕汪精衛爲俄共勾煽利用，也想爭取汪精衛爲合作反共

而努力，乃亦促汪回國。於是函電交馳，紛紛勸駕，大有「斯人不歸，如蒼生何」之概。

汪精衛原在巴黎，至是乃應國內各方的敦促，離法返國。他經過德國，繞道蘇俄，於十六年四月一日，回到上海。蔣總司令及在滬的國民黨要員，如吳敬恆（稚暉）、蔡元培、李煜瀛（石曾）、李宗仁、古應芬、黃紹雄等人，均對汪氏表示真誠的歡迎與擁戴。宋子文也由漢口趕來歡迎。汪精衛到滬之後，曾與上述諸人作過一連串的會議，他當時似乎對於共產黨比以前有了較深刻的認識，也提高了警覺，他曾對吳敬恆說：「共產黨素來不輕變更所定政策，共產黨實以國民黨爲利用品，本人亦不贊成共產黨之階級革命及勞農專政。且據本人觀察，國民黨與共產黨亦不易繼續相安，但本人希望暫能維持合作，自己願負調和之責。」

蔣總司令爲了表達支持汪精衛復職（按：汪出國時是國民政府主席，也還有國民黨的高級職務。）的誠意，曾於四月三日通電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，申明一致擁戴之忱，措詞非常懇切。他在電中說：「汪主席爲最忠實之同志，亦爲中正生平最敬愛之師友。……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，必能鞏固黨基，集中黨權，以底國民革命之全功，而竟總理未竟之遺志。……自汪主席歸來以後，所有軍政、民政、財政、外交諸端，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，完全統一於中央。中正唯有統率各軍，一致服從。至軍政軍令各有專屬，軍政大計，應歸統一。而中正獨司軍令，俾專責成。同心一德，完成革命。務仰各軍官長遵照此意，對

於汪主席完全服從，竭誠擁護。俾汪主席得自由行使職權，黨權得以真正集中，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，而促成三民主義之早日實現。」

蔣總司令和汪精衛，曾經幾度晤談。蔣懇切告汪，為謀自共產主產者手中挽救國民黨，必須實行「清黨」，并要求汪不要去武漢。汪精衛對於武漢方面排斥蔣總司令，雖然也表示憤慨，可是談到「清黨」却頗為躊躇。在一次談話中，他二人有一段很重要而懇切的對話。後來國府奠都南京，蔣總司令曾公開發表其要點。

汪對蔣說：「介石，如果這一回東南與武漢開戰時候，如果你失敗了，我們國民黨就要從此消滅，共產黨必就此起來。如果你得勝了，武漢被東南打倒的時候，國民黨就要恢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的狀況，要是恢復到這種狀況的時候，無論右派的軍隊，左派的黨員，一定不會同你蔣介石合作，你蔣介石在黨裏的生命，怕要從此消滅。」

蔣對汪說：「現在不是這個問題，現在是國民黨生存的問題。如果國民黨可以生存的時候，那麼無論什麼責任，我都可以担負起來，決不能自己不負責任，從中取巧，來做一個好人。現在我們不管成敗利鈍，同共產黨分離，就是國民黨失敗了，我個人可以負這個責任的，說國民黨之消滅完全是我蔣介石一個人攪出來的也可以。如果共產黨被我們國民黨消滅了，那只要他是純國民黨黨員，能為本黨奮鬥爭氣，無論什麼人，我都可以同他合作。他是左派也好，右派也好，都可以不管，總要把共產黨消滅了再講。」

「你切不要到武漢去，你去了一定不能出來，那時你想不做共產黨的工具亦不能了。你如果真正為本黨，那就要到南京去，然後再請武漢一班中央執行委員過來。如果到武漢去，國民黨還是不能團結，你還是要做本黨的罪人。」

蔣、汪兩人的這番對話，各有所見，各自堅持。以後事實證明，蔣總司令的見解完全正確，汪精衛的看法完全錯誤。可是蔣總司令這樣沉痛的忠告，汪精衛却無動於衷，仍然自行其是。他在與蔣總司令等人晤談的同時，却和共黨首領陳獨秀及周恩來等暗中勾搭。大概他受了陳、周的蠱惑，竟於四月五日，與陳獨秀發表了一篇聯合宣言，聲明「我們的團結，此時更非常必要。」并對國民黨人正在醞釀中的反共行動提出警告：「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，凡是瞭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，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。」四月六日，他就悄然搭船赴漢口，担任武漢政權的最高負責人。他這時的頭銜，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、組織部部長、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主席、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主席、國民政府常務委員（按三中全會通過，廢除國府主席一職）。表面上看起來，他集黨、政、軍大權於一身，實則聽人擺佈，作為鮑羅廷推行「聯俄、聯共、農工」三大政策的工具罷了。以後汪在武漢，逐漸認清了俄、共篡奪權力的陰謀，與其在鄂（湖北）、湘（湖南）、粵（廣東）、贛（江西）各地瘋狂暴動的罪行。受到兩湖（湖南、湖北）軍民奮起反共的刺戟，以及國民黨反共同志的鼓勵和召喚。不得不幡然改圖。

於是年七月十八日，以「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」的名義，在武漢中央日報上發表了「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」，便是一般人所稱的武漢「分共」之聲明。他話是這樣說了，却并未認真執行。直到八月一日共黨在南昌實行暴動後，他才氣憤的說：「為什麼容共政策到發現了第三國際給鮑羅廷、魯依的命令，還不把他們一個個抓來槍斃？」這才算是汪氏的真正「分共」。可是他「分共」雖然是確實分定了，却不肯與蔣總司令合作，仍然在堅決的「倒蔣」。此後數年，他於顛沛流離中，經過了幾番風雨。直到民國二十一年，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，主政中樞，與蔣介石委員長再度合作，共同担负安內攘外的大任，他曾公開說是「跳火坑」。二十四年十二月，被刺出國，二十五年十二月，西安事變發生後，回到南京，仍任黨方重要工作。二十七年夏，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，他出任議長。二十七年底，他又脫離抗戰陣營，離渝（重慶）出走，與日本軍閥勾搭，潛赴南京，組織傀儡偽政權，又說是「曲線抗日」。最後落了個身敗名裂，自毀其在前期革命中的光榮歷史，寧不值得嘆息！他究竟是意志不堅？（他始終信奉三民主義，晚年也一直堅決反共。）認識不清？抑或貪圖權位？另有隱情？恐怕要待後世史家，下一番深刻的研究工夫。不過他結局的大錯鑄成，晚節有虧，殊不易作出翻案文章了。

馮玉祥夾攻唐生智

「槍桿子出政權」，是毛酋澤東擴大叛亂時

所強調的一句口號。實際上這句口號，早在民國十五、六年武漢政權的時代，鮑羅廷和其俄、共黨徒，就已經實行了。鮑羅廷於十五年十一月，經過南昌，到達武漢，他發覺蔣介石總司令自有其堅定的立場和主張，不能與之合作。便想另找一個「有野心、可利用」的軍頭，取蔣總司令而代之，作為支持他的實力。恰巧這時手握重兵，駐在武漢的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唐生智，正好具備這一條件。於是就向他痛下工夫，大事拉攏。唐生智原屬趙恆惕部下的湘軍，十五年六月北伐前夕，歸附革命，被編為第八軍。北伐出師時，他担任前敵總指揮，率領其第八軍和第四、七兩軍，協力攻戰，很快的克長沙，下武漢，奠定了兩湖（湖南、湖北）地區。他年齡不大（廿九歲），慾望不小。由於勝利衝昏了頭腦，激起了更大的野心。他不衡量本身的主觀條件，和許多多的客觀因素，竟妄想借重鮑羅廷的支持，攫取革命軍總司令的職位。一個有野心，一個有陰謀，俄、共要利用唐生智為反蔣的工具，唐生智想利用俄、共為他攫取最高權位的靠山。於是在互相利用的動機下，一拍即合，深相結納。鮑羅廷指使他的黨徒，運用各種方法，提高唐的聲望，擴張唐的地盤和權力，以滿足唐的需要。同時分化革命軍的陣容，削弱蔣總司令的實力，以加強唐生智的地位。唐生智本人則更採取了若干為達目的，不擇手段的作法：（一）向鮑羅廷提出蘇俄直接對他援助武器和經濟的要求，不必經過國民政府。這一要求，因為交通及其他因素的限制，未能做到。（二）曾跟日本人有所勾搭，希望得

到日本方面的支持和援助，但無結果。（三）自行擴充軍隊，把他原轄的四個師，擴編為第八、十二、三五、三六等四個軍。（四）當蔣總司令督師進攻江西，與孫傳芳激戰之時，他不但頓兵武漢，坐觀成敗，而且暗中與孫傳芳進行秘密談判。以後他出師「東征」又與孫傳芳協定夾攻南京。與張作霖協定張攻馮（玉祥）、閻（錫山），唐取南京，成功後南北議和。（五）把蔣總司令留駐武漢，担任衛戍，由第四軍分編而成的第十一軍（陳銘樞）、及在鄂西地區由黔軍改編而成的第九軍（彭漢章）、第十軍（王天培）等部壓迫驅逐，以完成他對兩湖地區的獨力控制。（六）發動「保定系」將領間的「聯合運動」，企圖組織一個「反蔣聯盟」。最初已有成議，終因權力爭執，未能結成一個有形而堅固的集團。

鮑羅廷到武漢後，敢於肆行無忌，成立「臨時聯席會議」，召開三中全會，代國民黨「提高黨權」者，除利用一些共產黨徒、左傾份子，投機政客，為其吶喊奔走外，支持他的主要實力，即為唐生智。唐生智也就在這俄、共的導引和其醉心於權位追求之下，得以大事擴張，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，與蔣（介石）、馮（玉祥）、閻（錫山）三位比肩而立，從事於一連串的狂妄行動。十六年六月，他與馮玉祥會師鄭州後，不再合力北伐。却回師武漢，於七月下旬，由鄂出師，發動對南京的「東征」，與南京方面的軍隊，相持於安慶、蕪湖之間。當時他認為蔣總司令已經下野，正是他奪權謀位的大好機會。但因他與譚延闓、程潛、李宗仁、朱培德等握

有實力的人物，均有夙怨，積不相能。而他最大失策，為人所不諒的，則是在「東征」之初，就已蓄意於消滅南京方面的軍事力量後，以革命軍最高統帥地位，轉而與北方謀和。他一面派人到蚌埠，與孫傳芳進行勾結，約其夾攻南京，龍潭之役，此乃主要的導因之一。當何應欽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等部聯手，與孫傳芳部酣戰之際，他如乘機東進，未嘗沒有奪取南京的可能，但他却按兵不動，坐失良機。以後南京派兵「西征」，他也未加力抗，撤回武漢，旋即通電下野，此中「玄機」，令人難解。他的部將李品仙前數年在台北出版的回憶錄中，力言唐生智與孫傳芳勾結之非實，且亦沒有與南京堅決為敵之意，然耶否耶？似成一待解的謎。另外他又派人到北京與張作霖簽立密約，張攻馮（玉祥）、閻（錫山），唐取南京，事成之後，雙方言和。這一陰謀揭露後，引起了各方公憤。南京政府乃於十月二十日下令「討唐」，以程潛為西征軍總指揮，率領其第四路軍，李宗仁的第三路軍，朱培德的第五路軍，以及若干海空部隊，溯江而上，大張撻伐。馮玉祥於十月二十四日，發表通電指唐為「賊」，派兵沿京漢路南下，夾攻武漢。駐在鄂西地區的第三軍魯滌平、川軍楊森、黔軍李燦等部，合組西路討唐軍，沿長江東進，以拊武漢之背。廣東方面的第八路軍李濟深，也派兵北進攻湘。而唐部三十五軍軍長何鍵，又復接受南京方面的策動，對唐背離。唐生智便在這樣四面受敵內外夾攻的情況下，無法支持，於十一月十二日通電下野，擾攘一時的寧漢分裂局面，至是乃告結束。